

社会关系变迁的结构化过程： 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视角

张 桐

提 要：工业社会的人被“公民”这样的抽象身份赋予了人人平等的外在形式，但在实质上，却被结构化进入一种不平等的结构之中，这正是一种表面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工业人的生活状态与思维模式均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碎片化为中心—边缘结构的生成提供了便利，中心更容易对边缘实现支配，而边缘则倾其全力向中心靠拢。工业人的生活同时是符号化的，他们被组织符号化，又同时将符号化作用于他人，全面的符号化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对工业社会之中心—边缘结构生成、巩固与变动的阐释的最终目的在于批判与超越，批判这一表面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结构，进而在对未来的构建中实现对旧结构的超越。

关键词：工业社会 社会关系 社会结构 中心—边缘结构

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古老议题，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以及它们的变迁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自人类进入后工业化进程以来，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在后工业社会将转向何方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结构转型等课题再次成为研究的关注点。就“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三阶段分析框架而言，毫无疑问，重新回顾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将为我们探索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未来转型提供经验与启示。目前，关于社会关系及其变迁的研究已相当普遍，但是关于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讨论尚有不足。本文尝试探讨，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社会关系的变迁如何影响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如果能有效回答这一问题，当我们窥探到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关系的某些变动迹象或趋势时，就能更清晰地想象社会结构在后工业社会即将呈现出的未来图景。

从工业社会的形式平等与实质不平等的两面性出发，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可以被称为一种“中心—边缘”结构。本文的重点就在于努力阐释社会关系的工业化变

动与我们所称的中心—边缘结构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即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社会关系的某些工业化变动如何造成了社会关系中的表面平等，但同时又导致了实质的不平等，这些变动为中心—边缘结构的生成或发挥作用提供了怎样的基础或影响？同时，作为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与批判力的分析视角（张康之、张桐，2014），中心—边缘结构已经在国际关系、区域经济、组织管理和文化哲学等众多领域崭露头角，将其运用于对社会关系及其结构变迁这一社会学议题也将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就学术研究而言，社会结构应当是一个独特的分析概念，不应当被泛化成一个无所不包的词语。有关结构的特殊性，华尔兹（2003：54）关于结构分析与结构理论的相关表述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启发意义的价值。华尔兹明确区分了三个分析层次：结构、单元间关系和单元。结构所反映的是体系或系统的属性，它与构成体系的单元和单元间关系是不同的分析层次。华尔兹甚至有些极端地强调，在结构分析中必须剔除另两个层次的干扰，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区分出哪些事实或结果是由结构导致的，而哪些是由单元或单元间关系这些次级层次所导致的，也唯有此，我们所构建的理论也才可能称得上是一种系统理论。华尔兹关于结构之特殊性的说明是颇有价值的，它有助于我们清晰界定“结构”以及相关的“结构转型”、“结构变迁”或“结构调整”等议题的边界（张桐，2017），而不是任由其沦为毫无内涵的流行词，变成“系统、组织、复合体、图景、类型的同义语”。但是，华尔兹的结构决定论着实有些偏激了，他所辨明的三个分析层次之间显然是相互影响的，结构固然重要，但单元和单元间关系也会对结构产生重要作用。就社会结构而言，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社会关系（包含社会关系中的个体与个体间的交往互动）的变动如何促进了整体社会结构的变迁。在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中，就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的特征变化来看，我们大致可以辨识出三类：身份与角色的变动、个体的碎片化、个体的符号化（麦克卢汉，2011；张康之，2015），本文就试图从这三个方面阐释社会关系的变动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一、身份—角色的变动：使中心—边缘结构成为可能

一般认为，农业社会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等级身份制，在其中个体被要求去做与其身份相符的事情，事实上，更多的并不是被某种类类似于工业社会的外在制度“要

求”如此，而是因为一种共享的共同体文化的内在“要求”而如此，以至于人们将其视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不会理性地认知和分析这种要求。而到了工业社会，人们基本的共识是，身份等级制被打破了。但是，对于这一判断至少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身份等级制被打破，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社会规定的身份的消解。相反，人的身份变得多元化了，因为人们至少获得了与领域分化形成的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相对应的“公民、市民和家庭成员”等普遍而抽象的身份（张康之，2015）。正是这种普遍性（由于抽象而获得的普遍性）给工业社会的人们制造了平等的身份氛围，这些普遍而平等的身份替代了农业社会那种等级制的（例如贵族和平民）不平等身份而成为一切社会建构的基础。这种替代是通过对身体概念或观念的基础的替换来完成的，因为农业社会的身份是建立在那些人们无法选择的自然因素（例如出生地和血缘）基础之上的，而工业社会的公民身份则是以理性的外在制度的形式被规定了下来，其中的自然属性则弱化了许多。这样一来，在一个特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由于同时都具有公民的身份而不再在法律的意义上被分为三六九等。尽管人们仍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身份（例如国籍，但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变化），但是至少对于一个个体而言，他与其周围的人之间不再有法律上的身份差异。

也就是说，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农业社会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基于感知的拥有共享文化的立体的等级结构，而在等级结构崩塌后所建立起的工业社会的社会关系就必将是在一个平面上铺展开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要求在同一个平面上展开的。然而，正如农业社会虽然是一个感性的混沌体系，但仍然具有一种（等级）结构来整合社会关系以为人们的行动提供一个基本的框架一样，工业社会的社会关系虽然被要求在一个平面上展开，但人们并不是像一盘散沙一样随机地散落在这个平面上，而是形成了一种可以被称为“中心—边缘”的结构。也就是说，工业社会只是在形式上显示出同一个平面上的平等社会关系，而在实质上，由于一些人处于中心、更多的人分布在边缘，则呈现出了另一种不平等的结构。这就是我们关于身份等级制在工业社会被打破这一判断的第二点说明，即身份等级制被打破，只意味着农业社会的那种基于自然因素的不平等身份被打破，而并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完全消解。就身份而言，赋予工业社会平等形式的就是公民这样的普遍身份，为了强化这一点，不管是理论叙述还是制度设计都将公民作为基本的出发点，但是，这些方案只是在形式上为人们设定了各种平等的场景，实质上则不然。例如，法律

可以选择将什么人排除出公民身份之外，反过来，却只有少数人才可以选择更换自己的公民身份。更何况，工业人除了这种普遍身份，还有更多具体的身份，社会成员在获取这些身份的资格方面也不是平等的。甚至，还有一些未被承认的身份，这些人还处在为自己的身份承认而奋斗的阶段中。因此，关于工业社会之社会结构的理论或模型应当能够同时反映形式平等与实质不平等这两个特点。

对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关系而言，身份仅仅为人们进入某个领域提供了一种资格，在具体的行动过程中，人们又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多元化身份、多重角色以及二者之间的多种互动让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化。角色是与组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工业社会是一个完全组织化了的社会，角色在其中也就发挥着重要作用，或者说，在大部分人都具有的公民等抽象身份的基础上，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尽管公民身份也蕴含着一定的强制性，但由于其指向的是抽象的公民群体而非具体的个人，这种强制性应当说比较弱；而角色则不同，工业社会中的人们都是通过组织开展活动的，组织对不同角色设定的规则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就更具有强制力。组织预先根据某种需要设定了岗位和职位，并规定了其所需要的人，进而从众多候选者中进行招募并加以培训，个体在被组织化的过程中也总是压制个性而变成组织所需要的那种人，这就完成了角色对人的塑造。角色的形式化特征表现在他对个体的同化作用，即用一个预先设定的模具去形塑一个人，组织所设立的各种表面平等的程序只是不同的筛选过程，通过层层筛选以及入职后的打磨，最终成功将一个原本完整的人塑造成完全适合于那个模子的人。这样一来，角色就变成了一种工具，从组织一方而言，是组织或组织中某些个体实现利益的工具，从角色扮演者及边缘一方而言，他们也只是把角色当成实现自己的利益的工具，即通过扮演各种角色换取自己的生活所需。“人们并不是出于某种真实的内在要求去扮演某种角色，而是出于利益、权欲等要求去争夺职位、岗位。”（张康之，2015）人们既然不能在虚假的角色扮演中过上真正的生活，就将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在这种形式化的生活中向某个形式化的目标（例如某个组织职位）奋斗。在社会关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中，那就是绞尽脑汁、竭尽所能地向中心靠拢或成为中心，而不是在自己的位置上享受真正的生活。也就是说，一方面，那些边缘者的境遇没有给他们享受的资本，他们必须通过进军中心来换取这些实在的利益，但同时，这也是整个社会的整体氛围，无论是中心还是边缘，他们都难以追寻自己的真正的生活，而只能追求形式化的利益。

二、个体的碎片化：为中心—边缘结构提供便利

工业化导致了个体的碎片化，即人不再是完整的人，人被技术、组织、规则肢解开来，个体在某个碎片上努力过完一生。导致个体碎片化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工业社会的技术发展、领域分化、社会分工、完全的组织化与思维模式等。麦克卢汉就指出，技术发展对现代人实现了单向的延伸，例如车轮的提速大大延长了人的腿脚，电话和广播等媒介的普及延伸了人的声觉系统，但是，与单向延展相伴的却是具有综合思维能力的大脑的萎缩，拼音文字、印刷物、电视屏幕延展了人的视觉功能，却剥夺了人深度思考的能力，在大脑对这些视觉冲击物无须过多加工的情况下，人已经得到了各种前所未有的满足（麦克卢汉，2011：10）。而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已经主导了整个工业社会的一切，“在这个社会里，生产设备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艺和态度，也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欲望”（马尔库塞，1988：7）。

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混沌一体，工业社会出现了领域的分化，其中最主要的分化就是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分化。对于个体而言，这种分化意味着人的生活世界的碎片化，即人至少要在三种不同的领域中过三种不同的生活。这种不同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人要去经历或者去做不同的事务，而是人们必须学会运用不同的价值观念去在三种（甚至更多）不同的世界中穿行，或者说努力去适应不同的原则，这几乎成了现代人生活的一项必备技能，如果没有这项技能，其生活就会陷入困境。当他在私人领域中出现时，他是在自由市场和平等交换的观念下行事的，他为了个人利益而计算、谋划并和他人讨价还价；当他出现在公共领域时，他努力发表个人关于某个公共事务的意见，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甚至要与那些可能损害自我权利的人或群体进行抗争；而当他出现在日常生活领域时，他得以（至少部分地）卸下面具，自如地释放着自我的情感。这些相互独立且排斥的原则不允许人们将错误的价值和行为习惯带入错误的领域中。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官僚制组织要求其成员不得将个人在日常生活领域的情感带入其工作中，也要求组织成员将换取酬劳的工作行为与私人的购买消费等活动分开。

从社会交往的结构来看，我们可以说，正是一种被分化进而造成相互隔离的结构造成了人的碎片化。反过来说，当作为个体的人是不完整的、碎片化的时候，中心—边缘结构才更容易建立起来。一方面，正如领域分化才让现代诸如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这样的概念和分析性思维成为可能一样，当个体不是以一个完整的人出现，

而是被分裂为不同的身份和角色，并在不同领域中过着不同的生活，我们也才能用分析性的语言（例如中心与边缘）来界定人际之间的交往。另一方面，当个体只是被单向延伸的时候，边缘只需要在某一个极狭窄的领域上取得成功，取得中心设立的标准所界定的那种成功，沿着边缘向中心的连线在这个单向上进发，这就是边缘毕生的努力，这也让中心对边缘的支配更加容易，同时显得更加隐蔽，总体的中心—边缘结构也就更加可能了。如果个体过着完整的生活，他们真正理解并享受自己的生活，也理解和尊重他人的生活，他们就不会以某种他人设立的标准为奋斗目标，中心—边缘结构也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基石。

人的单向延伸不仅弱化了人的整体性思维，而且，与这种碎片化的个体生活相适应，人的思维方式也同样是碎片化的。用麦克卢汉的话说，人们不仅生活在“专门化的、分割肢解的中心—边缘结构的文明”中，而且“在使用陈旧的、前电力时代那种支离破碎的时间模式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麦克卢汉，2011：114）。正是由于领域之间的界限分明，同时由于工业社会的学科体系，对工业社会的理解也就有了从不同领域出发加以分析的不同视角，这些视角之间彼此分割，以至于当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需要运用总体性视角去考察人类社会时也很难走出这种分割。例如，关于人的假设，现代人就提出了诸如“经济人”“政治人”“行政人”等多种假设，这些不同的假设无非是对社会成员在某种情境下彰显出的特质的特殊强调，对于习惯了学科分割和有限思维的现代人而言，人们不仅能够接受而且热烈拥抱这种思维方式，这就使得从不同假设出发的主张都彰显出了一定的解释力。对于那些认为这个世界因为复杂而很难认识的人而言，只要透过某种单一的视角认识到部分甚至是片面的图像，他们就知足了；而对于那些在认识论方面更加傲慢的人而言，他们则声称这是在“窥一斑而知全貌”，进而用某个狭窄的视角及其观察结果批判持有不同视角和主张的人，而不愿放下傲慢去聆听他人。

对于人际交往而言，我们也许能从这种思维的碎片化中为如下现象找到部分解释。前工业社会的信任由于是总体性的，也就是说，人们对于他人要么信任要么不信任，因为人是作为一个整体被看待的，正如陌生人是一个整体概念一样。相比之下，工业社会由于信任的终极对象不是人而是契约，对于人而言，如果存在某种表面的信任的话，也只是部分的信任，只是在与其发生交往的方面或者说被契约规定了方面存在（不）信任的问题，而至于其他方面，则不重要甚至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对所谓“合作伙伴”的其他方面评价并不高，但是他

们之间的协作行为却一直在持续。这就意味着，只有在他们相互交往的方面，双方才是认可的，因为这是可以给他们带来利益的。

三、人的符号化：对中心—边缘结构的巩固

工业社会的人不仅在不同领域中穿梭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对于每一次扮演都只是符号化的、形式化的。社会规则对个体的符号化使得社会成员仅仅是作为一个形式化的符号存在于组织和社会中。我们说，整个工业社会都是以一种官僚制的方式被组织起来的，也就是说，任何个体都生活于这个大的官僚制中，也当然生活在一个个具体的官僚制组织之中。官僚制组织要求组织成员剔除个体的性格，而成为非人格化的组织的一个部分，而整个社会也是由符号化了的社会成员组成，每个人作为一个零件共同构成了一部机器。

事实上，仅就分工本身而言，它并不必然会带来符号化的结果，人们从事各自的事情，却完全可以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其中而丝毫不用削减个性化特征。然而，工业社会的全面分工却不同。也就是说，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工与前工业社会的分工的重大差异并不在于精细化的程度上，即无论是在社会化大分工，还是一个生产部门内的劳动分工方面（林其泉，1988：116），工业社会都比前工业社会更加详细。但更为重要的差异则在于，首先，工业社会的分工是建立在家庭（生活）与职业（活动）相对立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官僚制组织要求的那样，组织成员被要求在公私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这种做法是希望将个体特征逐出组织的一次努力；其次，工业社会的细致分工最终导致大部分劳动者的能动的技能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以至于工人从作为生产流程/机器的一部分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如果说还需要什么技能的话，就只剩下服从人和机器的命令并自动执行的技能，“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马克思，2004：486）。这样一来，技术发展和管理方式足以让人可以毫无情感地“轻松地”参与一项工程。表面看来，这对于人而言是一项便利甚至解放，但这并非真正的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个体在不想掺杂情感的时候可以将任务交由机器完成，而在自己想注入情感的时候也能顺利如此。但长久以来，工业社会的分工却导致人们在想让其情感加入的时候已不再可能，甚至人们都很难提出这样的

想法。最终，分工本身变成了一种社会规划的工程，成为一种社会统治的力量。因此，无论是中心还是边缘，都被整个结构符号化了。这也是我们理解工业社会之中心—边缘结构的一个重要基点，即在我们强调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之前，我们必须记住，在工业社会的制度规则面前，包括中心与边缘在内的所有人都是被边缘化的。当然，更细致地区分，符号化的程度必然存在不同，中心之于整个结构的重要性显然要高于边缘，这一点就连边缘也深信不疑。

然而，这并不是符号化的全部。设想一下，尽管组织强烈要求组织成员以符号的方式存在于组织中，但组织成员仍然可以抗争，即使他无法在组织内实现抗争，也可以在组织外坚守自己的个性化特征，以真正的自己的方式应对他人和他事。然而，工业社会的符号化却是全面的整体性的。社会对其成员的形式化处理方式完全同化了成员自身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社会成员自身对其之外的他人和他事同样采取符号化的处理办法。工业社会的分工根本无须某个工人去了解他人的工作，或者说组织对雇员根本没有提出这一要求，而善于服从的雇员由于失去了自我判断的能力，自己也不会提出这一要求。他们仅仅专注于自己的那一部分，而不去关注同胞的工作，也就不会去理解同胞，甚至无须理解整个工程的程序和意义，也就无须理解自己在整个工程中的意义。当然，工业社会给人表面赋予的自由选择权并不阻止——像欧洲中世纪的一些手工业行会要求的那样（林其泉，1988：106）——人们这样去做，但是人们已没有意愿和精力去这样做。不仅对于处在工厂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如此，与他人的任何交往活动都是如此。对于官僚制组织中的组织雇员而言，他们也用同样的形式化方式对待他们的管理/服务对象，他们将这些对象视为一个个需要处理和应付的案例，按照规则将对象分成不同的类别，按照针对不同类别的处理流程加以处理。简言之，对于工业人的整个生活而言，既然生活以符号化、形式化的方式对待个体，个体也就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生活。正是如此，中心—边缘结构才得以扩散，当官僚制组织中的边缘成员以符号化的方式去应对他的管理/服务对象时，事实上是将其吸纳进官僚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并将其贬斥在最边缘的位置，如此一来，旧的边缘之外又多了一层边缘的包围，整个结构得以强化。

形式化的人缺乏思考，缺乏批判，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关于自己生活的所有要求和想象都不是出于自己的理性提出的，而是被塑造出来的，因此马尔库塞称这样的工业人为“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失去了从自我出发向社会提出要求和批判社会的向度。因为，工业人的生活是简单的，那就是在工业社会的生产流水

线上努力做好自己那一份工作，不会做也不关心整个流程中的其他部分，因此工业人不仅无法真正地为自己而活，甚至也无法真正地为某种集体功能而活，尽管他被组织努力塑造成为某种集体功能的一部分。组织中的个体只需具备人类万千技能中的一种，并不断地重复劳动，在这种重复中换取报酬，进而换取自己一生的生活。就像组织要求他们的那样，人类甚至无须进行真正的思考。所有信息已经足够清晰，只需大脑简单地加工就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如果说需要“思考”的话，那人们只需“思考”（事实上是算计）如何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当福开森谈到工厂手工业的情况时说道，“无智……是产业之母，思虑与想象力是易犯错误的。手足的活动习惯，既与思虑无关，也与想象力无关”（卢森贝，1960：283）。在工场手工业如此，在大机器工业时代就更是如此了。固化的职业分工体系将人们凝固在细分的工种上，由于缺乏对其他个体与领域的了解，加之组织化的体系剥夺了人的思考和想象力，创造力也就荡然无存了。这种创造力最好的反映就是在艺术领域，在前工业社会，为当代人津津乐道的诸如达·芬奇那样的艺术家大都身兼数职，他们不仅在横向上熟知（现代意义上的）多个领域，在纵向上也熟练掌握从设计到制作的整个流程；而工业社会的人，由于完整性的蜕化，由于被严重地符号化，此种能力已荡然无存。在后工业社会到来之际，这种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则越发显现出来，尤其严重限制了人类思考和建构未来的能力，因此，人们开始呼吁“想象”，呼吁不仅在“美学的领域”，也要“在科学的和规范的领域”，不仅要在“科学发现的语境”中，也要在“论证的语境”中让“想象”“发挥更大的作用”（法默尔，2005：270）。

四、总结与展望

在人类社会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中，公民等抽象身份的确立为人们赢得了平等，但这仅仅是理论上所确立的形式平等。实质上，人们则在同一个形式化的平面上形成少数中心与多数边缘的不平等分层。人的碎片化让人们变成不完整的人，也使得少数中心对多数边缘的支配与控制成为可能，而人的符号化则让人们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和想象力，也就很难认清这一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实质及其原因，更难对其进行反思与抗争。本研究希望通过中心—边缘结构的视角对工业社会的社会关系及其结构化过程提供不同的理解，也希望推动中心—边缘研究的进

进一步深化。

回到我们最初的讨论，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即华尔兹所谓的单元层次）变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另一个同样有价值的议题是通过对社会关系中人际交往（即华尔兹所谓的单元间关系层次）的变动来理解社会结构变迁。在人类的工业化进程中，人际交往的基础从习俗变成了契约，人际交往的形式从互助变成了协作，同时协作又与竞争相伴相生，这些变动如何影响了社会结构的生成与变迁，对历史的这一回顾又将怎样帮助我们理解未来的社会结构转型，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当然，对工业社会之中心—边缘结构生成、巩固与变动的阐释的最终目的在于批判与超越，批判这一表面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结构，进而在对未来的构建中实现对旧结构的超越。从工业社会强大的中心—边缘结构来看，未来的社会结构将呈现出一番“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图景，那是一种处在动态流变中的结构（更准确地说，不是某种稳定的“结构”，而是一种“构形”），也许某个单元在此时此刻会扮演中心，但在彼时彼刻又变成了边缘，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

参考文献：

- 法默尔，戴维·约翰，2005，《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吴琼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华尔兹，肯尼思，2003，《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林其泉，1988，《分工的起源和发展》，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卢森贝，1960，《政治经济学史》（第三卷），郭从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马尔库塞，赫伯特，1988，《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 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麦克卢汉，马歇尔，2011，《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张康之，2015，《社会治理的依据：从身份到角色》，《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第5期。
- 张康之、张桐，2014，《论世界体系中观察视角的“中心—边缘”概念》，《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 张桐，2017，《社会治理体系及其结构：对一个学术问题的重新界定》，《中国行政管理》第9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姜宁宁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tention of the introduction of professional managers is not simply determined by the principle of cost or efficiency , but also by 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legitimacy and uncertainty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e prevailing context of familism , the management model of professional managers , as the exotic “best practice” , can be a strategic mean for companies to enhance their legitimacy in special periods. Meanwhile , its benign development requires a relatively stable pattern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Re-Entering the Forbidden Mountains: The Governance History of Jingxiang Refugees in the Ming Dynasty *Zheng Peng & Chen Guangjin* 141

Abstract: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 the Jingxiang forbidden mountains policy led to a large-scale explosion of the refugees. The refugees recreated their “Paradise” by adjusting their living styles and growing patterns to develop along with natural environment. However , after the military conquest of the rebellion , the governments naturalized , resettled and taught the refugees to become residents called “Qimin”. Thus , there was experience from “reigning but no governing” to “governing” , and then from “having no civilization” to “mountain civilization” and then the “national civilization” in the space of 500 square kilometers of the mountains. It demonstrated the vertical governance of state-building.

Social Connection , Social Structure ,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Perspective *Zhang Tong* 167

Abstract: After the breakdown of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n the Agriculture Society , human beings in the Industrial Society have been awarded the formal equality by sharing the common abstract identity such as citizen. However , substantially , they have been involved in a new unequal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The industrial men are living with various identities and roles , and have to shuttle back and forth between different arenas based on different principles. Therefore , their life and thinking mode have presented a feature of fragmentation ,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generation of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The industrial men have also presented a feature of symbolization , which finally has strengthened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and deprived people’ s ability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imagination.

RESEARCH REVIEW

Th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of Family on Education: Theories , Methodologies and Evidences *Zheng Lei , Qi Xiang & Hou Yuna* 177

Abstract: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parents’ education and other related socio-economic status factors